

文章编号:1003-9104(2011)03-0111-06

撕裂:体味萧何之痛*

——新编京剧《成败萧何》题旨的思辨性探析

万 素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 艺术司,北京 100020)

摘要:上海京剧院新编创的京剧作品《成败萧何》将人物投放到滚滚滔滔、雄浑磅礴的历史大势裹挟之下,去审视他们个体生命的局限和陷入群体的无奈,并由此进入人性反思。作品涉及了道德、责任、友情、生命、人格、天性、人的尊严及国家与个体关系等伦理范畴,颇具人文品格,力求由审美判断进入更加深邃的哲理思辨层面。作品对社会、历史、时代与现实具有锐利的穿透力,渗透了对生命价值、人生境界、理想信念和精神价值取向的期盼。

关键词:戏曲艺术;京剧;《成败萧何》;艺术创作;人性反思;人文品格;艺术作品;哲理思辨;精神价值取向

中图分类号:J821

文献标识码:A

上海京剧院新编创的京剧艺术作品《成败萧何》之所以能立足当代文化语境,在于向人文思考与美学表达两个维度的掘进中寻觅到一条传统艺术走向现代的通途。回溯 20 年前,上海京剧院一部《曹操与杨修》横空出世,令当代人灵魂为之震颤。评论家指出这部作品在不经意中“碰撞到了当代广大中国观众一种共同的心理潜藏”,并“触及了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唤醒了“人文—历史哲理”的思考^①。新编京剧作品《成败萧何》涉及了道德、责任、友情、生命、人格、天性、人的尊严及国家与个体关系等伦理范畴,具有丰富的现实内涵,能启迪当代人思考,是对新世纪以来京剷新编历史剧创作成就的再一次刷新。今天,我们可否认为京剧《成败萧何》的创作,在人文色彩的涂抹中达到了近于《曹操与杨修》的浓度、厚度与深度,是又一部引发“人文—历史哲理”思考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

在汩汩流淌数千年之久的中华民族历史长河中,“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之说已流传两千余年,其所引发的困惑也已悬置两千余年。2004 年,上海京剧院有识之士们重拾这一困惑已久的话题。咂摸着其间散发的悠远苍凉的人生况味,他们站在今天应有的思想高度重构想象,重新观察、审视和梳理这段尘封已久的历史,试图探究这一历史悬案中深蕴的文化内涵。上海京剧院以宽广的胸襟力邀编剧李莉、导演石玉昆、舞美设计薛殿杰等舞台艺术创作大手笔加盟。创作者将剧作旨趣定位于对“成败岂能由萧何”的哲理思辨,由历史人物个体生命轨迹演绎出一场发人深省的历史悲剧。6 年前,剧组带着对宏阔历史的深入反思踏上了《成败萧何》的艺术创作之旅。尽管当初“成败”未卜、如履薄冰,但毕竟是 在大量实践积累坚实基础上的又一次前行。他们信心十足地一遍遍磨

*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211 工程”三期“艺术学理论创新与应用研究”项目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万素(1947—),女,汉,安徽安庆人,研究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艺术司《艺术通讯》编辑部主任,中国戏曲学会秘书长、办公室主任,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研究员,曾任《戏曲研究》编辑部副主任、《中华戏曲》编辑部主任。研究方向:戏剧戏曲学。

砺、一次次淬火,使作品的题旨不断深化、人文精神不断攀升,终于锤炼成一部于雄浑中透着苍凉悲壮之感的大作、力作。

新编京剧《成败萧何》颇具人文品格,对社会、历史、时代与现实具有锐利的穿透力,绝非时下大多数流于编故事、浅显直白地图解观念或直奔主题等平庸之作堪与比肩。剧作以韩信被杀始末为故事主干,穿凿起跌宕多姿、环环相扣的情节线,又不停留于叙事表层的惊心动魄,而着力探究人物内心世界和精神世界,注重人物深层心理意识的挖掘,竭力开掘出人性的复杂、诡秘和剧中人的真实心性。创作者以现实主义手法把笔触探入人物心灵深处,精心演绎萧何、韩信、刘邦、吕雉、钟离昧及萧静云等活灵活现的人物性格、心理、意志、情感纠葛及命运走向。创作者笔力所致全在于写人、写心,把握了以人为主体的创作思维,是真正把人当作表现的目的而非传达理念的手段,由此回归到戏剧本体的艺术表达。剧作力求揭示不同人物的一次次戏剧行动,乃至一句念白、一段唱腔、一招一式身段工架背后的行为动机和心理依据,挖掘出各自的行为逻辑和性格逻辑,使当代观众能窥测到人物的心灵状态并与他们产生心灵感应。

彻底摆脱长期以来文艺作品作为政治附庸的尴尬地位,追求艺术自身独立品格的回归,标志着新时期以来我国文艺工作者文化自觉意识的觉醒,上海京剧院《曹操与杨修》的问世已开风气之先。然而,彻底摈弃文艺创作中的思维惯性,让艺术回归本体的道路依然漫长。继《曹操与杨修》之雄风,上海京剧院一直追求在创作观念更新的道路上披荆斩棘、勇往直前。他们凭藉“成败岂能由萧何”的故事媒介,在当代京剧舞台上艺术地展现历史人物的生存方式和他们的命运流变过程,力求对绵延数千年之久的我国封建社会历史文化作一些哲理思考。

创作者将笔底人物投放到滚滚滔滔、雄浑磅礴的历史大势裹挟之下,对他们个体生命的局限和陷入群体的无奈表示理解、同情、悲怜与感慨,并由此进入人性反思。编剧李莉深有感触地说:“经过两百多年战祸纷争煎熬的生命集体,期盼和合、期盼安宁,这是历史的大潮流、人心的大趋势。个体生命在这大潮流、大趋势中,必定会有相应的大局限,谁也无法自觉超越”^②。剧作无意对剧中某个人物作单向度的评判,而要引导现代人思考在这种大背景之下生命个体的局限和群体的无奈。虽然,剧中各色人等在人性展示中已被涂抹上不同色调,丑陋也罢,高尚也罢,阴暗也罢,阳光也罢,猥琐也罢,灿烂也罢……都是身不由己的生命存在及他们各自与命运搏击过程中的客观折射,谁也无法自我超越,谁也无法突破。创作者以此视角向人文—历史哲理又一次掘进,力求使作品呈现出厚重的历史文化意蕴和弥足珍贵的人文价值。

二

京剧《成败萧何》的戏核是,当初鼎力举荐良将韩信的丞相萧何,迫于皇权高压参与了宫廷杀戮,沦落为刘邦、吕雉谋杀韩信的帮凶。同是一个人,“十年前举荐韩信,十年来力保韩信,十年后追杀韩信”,其立场的颠覆性逆转匪夷所思,戏核就深藏于这复杂的历史悖论之中。十年前萧何荐良将心切,月下追韩信不辞辛劳。当初韩信也确实不负众望,定三秦、破魏赵、夺燕取齐、叱咤风云、决胜百战,立下了赫赫战功。照说,他二人对刘邦兴汉灭楚建立大汉一统江山都是立了大功的。然而,一旦战火平息、天下太平、封建政体稳固了,君臣关系就会发生微妙的变化。此时,严峻的信任危机也就无可避免地横亘在君臣之间。强势的皇权集团居高临下、以强凌弱,迟早会上演一场“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的历史悲剧,无数史实记载表明这已成为封建时代权力操纵者的思维惯性。更何况,韩信又是那样生性桀骜、率性而为、居功自傲、不甚检点、行为失据、不识时务。他不肯唯唯诺诺、摇尾乞怜或夹着尾巴做人,只图一时痛快和自在,虽已是危机四伏一触即发,却张狂依旧不肯收敛一二。因此,刘邦、吕后对这种人早就恨得牙痒痒的,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这是一场有关生命、人格和人之尊严的持久较量。剧中刘、吕皇权集团为维护自身的利益牢牢攫住权力之柄,必然要剪除心腹之患。他们操纵强大的国家机器,玩弄卑鄙伎俩、滥杀无辜的一系列戏剧行动杀气腾腾,演绎出一部封建政体内部血与火激烈交锋的、活生生的历史。剧作展示了独立人格与封建皇权的尖锐冲突,揭示出文化人格被践踏和精神意志被奴役给人的心灵带来的巨大伤害。虽然就维护大汉皇权而言,刘邦、吕雉的种种作为并非不义,但历史通识对他们的人品高下实在不敢恭维,他们早已被世人推向道义的被告席。然而剧作旨趣并不着力于孰善孰恶的道德评判。其实人与人的关系终极表现都是利益关系,本不取决于人性的善恶,更何况“兔死狗烹”之功利行为也是历朝历代所常见的。

当代文艺评论家仲呈祥认为,《成败萧何》是把握了历史内核的,是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把握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历史精神。他指出:在中国分封制到郡县制转换的历史关口,安定和战争是个什么关系,这样一种大历史氛围中,活跃在其间的历史人物他们的精神价值取向是多么的复杂^③,对我们理解剧作不无启迪意义。让我们拂去历史的烟云,穿越时光隧道,回到公元前206年。那一年,汉高祖刘邦建立起西汉政权,此前华夏民族连年征战长达两百余年的苦难岁月终于了结,整个民族的肌体饱受战祸摧残早已疲惫不堪亟需休养生息,朝野上下都在祈祷太平盛世:再不要兵戎相加、刀兵相见了,再不要相互杀伐了。珍

惜生命吧！这也许就是剧作家李莉潜意识中的心灵呼唤与叹息。剧作曾借人物之口历数了楚汉相争给人民带来的战争劫难：长平一战，眼睁睁九十余万将士阵亡；彭城半天，血淋淋十万联军丧命；垓下决战，痛煞煞拼死十余万生灵。山河破碎，百姓罹难，村村萧瑟，家家丧亲……由此不难悟出创作者寓于潜台词中的深意。

剧中，刘邦一次次削兵权、夺帅印、贬齐王、遣散楚军，再贬楚王为淮阴侯以制约韩信，确系政权稳固之需；而韩信则贪功以功臣自居，憧憬重兵在握留恋分封制，对刘邦屡削兵权耿耿于怀，并恣意收留钦犯钟离昧、拒不伴驾出征，以种种忿怨举动相对抗。在刘、吕看来，韩信身为大汉将军却不履行职责、不为朝廷效力，留他何用？更何况“剪除异姓王”削弱异己力量，他们蓄谋已久。故而，韩信虽始终未有反叛之意，但他一味闹情绪对抗大汉朝廷，不利于汉刘邦政权的稳固，也是有悖于历史潮流的。有人评价这场谋杀中“合理与荒谬”并存，剧中“杀韩信”这个看起来残忍、不合理的极端行为，在汉初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虽然“无奈”却又变得极其“合理”了^④。西汉初年君臣上下剑拔弩张、不可调和的剧烈冲突终于酿成了这场大悲剧。如此看来，对峙双方各自都有合理性，不能简单地以是非善恶褒贬。我们从悲剧的冲突双方各自占有合理成分，也可多少体味出黑格尔悲剧美学思想的意味。

三

这部作品中最大的悲剧人物应是大汉丞相萧何。想当初，萧何鼎力举荐韩信；十年来一直回护韩信、力保韩信；十年间肝胆相照，相互视为生死知己。如今韩信对刘、吕皇权多有冒犯，甚至已被视为逆臣，构成了对皇室最大的心理威胁，萧何也是难脱干系的。因此，刘、吕皇权集团借刀杀人，瞅准了萧何的软肋下手，施展卑鄙伎俩以软硬炮弹狂轰滥炸，终于把他拖下了水。剧作正是沿着这条线索铺陈，营造出令人触目惊心的戏剧情境，把人物逼向绝境。创作者在事件、人物关系与人物置身的环境三者构成的巨大心理场中，掀动人物内心风暴，在剧中人情感、意志翻腾的波澜中透视其内心世界，凸现人物性格及其发展，推动人物命运逆转，充分展示戏剧性张力和巨大的艺术感染力。

既然汉高祖刘邦政权拥有“将相和志相投共事君王”之局面，理应成为江山社稷稳固、国运昌隆之大幸。然而，萧何、韩信这对生死知己惺惺相惜的情谊又是多么的脆弱，多么的不堪一击？陈豨叛乱竟然成为导火索，韩信称病不肯随驾出征，矛盾陡然激化，危机终于总爆发。出征前刘邦亲授吕雉护汉镇国之宝“斩蛇剑”，并言道：“奉剑如奉诏，面剑如面君”。“你当断则断该杀就杀”！吕后更是心领神会，当即

表示绝不“心慈手软”！绝不“留下后患”！于是，吕后口谕传萧丞相深夜进宫的特定戏剧情境，将萧何逼入了“事君王与保知己定难周全”的两难境地^⑤。萧何对韩信欲救不能触及到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核心问题“忠”和“义”，萧何必须直面灵魂的拷问，必须经受“忠义不能两全”的煎熬，真个是痛煞煞，怎不叫人“心意彷徨进退维艰”？

萧何深夜进宫之时，尽管已料定韩信反与不反吕后必杀之，仍然竭力为韩信辩白，据理力争振振有词。然而，骄横跋扈的吕雉阴险狡诈、卑鄙无赖、罗织罪名，不惜以其爱女肖静云的性命及夷灭一家三族相要挟。她使出浑身的解数，咄咄逼人、恩威兼施、步步紧逼，萧何终于招架不住。他一生坚守道德边界、秉持人格操守的心理防线节节败退，以致轰然倒塌全线崩溃，只落得忍辱吞声束手缴械。萧丞相不得已违心屈从吕后淫威充当其同谋，应允月下相追回韩信入未央宫受死，干起了出卖朋友这伤天害理的勾当。但萧何并没有昧着良心去诬韩信，而是如实相告韩将军：“萧何实乃为虎作伥、逼杀英雄的卑劣小人”！“萧何今日追杀将军，一为换取小女性命，二为换取府上下三百余口亲人，三为换取大汉江山安定、天下百姓太平”！足见其品行端正，绝非心理阴暗小人或奸佞卑鄙之徒。萧何与韩信诀别时有三拜：其一为大汉江山；其二为天下苍生；其三为萧何的良心。这三拜千钧重，拜出了“萧何生韩信死”对萧何良心、道义上的自我谴责，也拜出了萧何实乃“苦为天下免兵灾”的悲悯情怀，更拜出了萧何身为大汉丞相，却不能像韩将军那样“似闪电一刹横空去，裹风挟雨到泉台”而羞愧得无地自容。

“十年前月下相追追将才，十年后月下相追追命来”！“天是同样的天，月是同样的月，人是同样的人”，然而萧何的心境却有着天壤之别。虽则十年来，萧何也曾一而再、再而三地规劝韩信为人多收敛、不可太张扬，也曾在刘、吕面前多次为他袒护、辩白，丞相用心良苦，既为力保生死知己，也着实是为履行大汉丞相职责尽心尽力。萧何的心中十分纠结，外部事件的巨大压力与内部心灵的苦苦挣扎互为表里。背负着恪守传统文化人格的沉重十字架，在他的良心天平上，既紧紧地攥着道德的砝码又牢牢地守护着做人的准则。可以想见，当萧何迫于情势做出这万般无奈的抉择时，他必须直面、必须承受的是人性被撕裂、人格被撕裂、心灵被撕裂的剧烈创痛。这创痛是外部世界强加给生命个体的不能承受之痛。“卖友求荣”历来为人不齿。刘、吕皇权集团将其置于不仁不义之地，堂堂丞相顷刻间尊严荡然无存，顷刻间蒙受奇耻大辱，他将背负千古骂名，他将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此时此刻，萧何已陷入五内俱焚的悲凉心境，他的心在殷殷泣血……

剧中虚构人物萧何爱女萧静云的设置，不啻是作

为萧何内心投影而存在的侧笔。她敢于直言萧何“怕受牵连、明哲保身、屈从权势”的卑微怯弱,敢于当面顶撞、直言不讳,都符合丞相骄纵爱女的人物身份。萧静云就是萧何的一面镜子,投射出他内心冲撞中的另一种声音,正写也好,侧写也好,全在于揭示人物内心世界。当萧何自叹“丞相权重,竟保不住知己的一条性命”时,肖静云十分痛心地诉说:“将军一死,背的是永世英名,爹爹活着,背的是永世骂名!这天地良心,你叫他怎么背得起?你叫他如何扛得动啊?”这里不乏创作者的评判意识,不仅有政治评判、道德评判,更有人性的批判与反思。

细细想来,萧何的内心充满了悲悯意识:保大汉江山就是保黎民百姓,只有江山一统天下太平,黎民百姓才能安居乐业。作为大汉朝廷丞相位高权重圣眷正隆,为皇室化解危机萧何理应在所不辞,为免战火再起生灵涂炭他更应“背负起这漫天白幡永世悲哀”!萧何的心里不仅装着生死知己韩将军一人的安危,更装着天下苍生的安危,他是真正以江山社稷和黎民百姓为己任的。但是,他既然连生死知己韩将军一人的生命都无力相保,更何谈保天下苍生?这里,创作者又以犀利的笔触无情地撕碎了封建道德的面纱,将向以道德立世的丞相萧何掩藏于面纱之下卑微、怯懦的人性弱点暴露无遗。

就在剧终落幕之际,一面极具象征意味的“汉”字大旗正飘摇坠落,顿时响起主题曲合唱“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成败岂能由萧何”,这视听对位的巨大冲击力加剧了悲剧氛围的营造。此情此景多么意味深长!这里,创作者无心耽恋道德评判,其重心全在于“成败岂能由萧何”题旨的揭示,全在于把这种历史大趋势下个体生命的局限和生命群体的无奈像特写镜头一般放大,推向观众面前,由此启迪当代人对历史文化作出应有的独立思考。

京剧《成败萧何》的创作者站在人性的立场,对封建专制政体和宫廷权谋压榨之下的人性裂变予以深刻的揭示,细致地剥离出造成萧何内心撕裂、伤痕累累、血迹斑斑之罪恶渊薮。其实,萧何的人生悲剧依附于一定的人类价值秩序,依附于古代士人在“修齐治平”传统范型的修为中,力求实现历史担当、实现自我生命价值的苦苦求索,依附于入世者在政治理想和道德理想两级间徘徊的双重人生追求。萧何的无奈是带有普遍性的,这是个体的人陷入难以自拔的人类伦理困境时普遍会遭遇的无奈。创作者显然跳出了非黑即白的“二元论”思维方式,跳出了简单地从属于政治、从属于意识形态的拘囿,已立于更高的视点俯瞰人生,体味生命的价值和人的尊严,力求赋予作品更深厚的文化蕴涵。

四

创作者对剧中人韩信的态度也是复杂的,是在责

任与性情的碰撞中立体地描摹出韩信的鲜活形象,对他的一味任性、不识大体、鲁莽骄纵是有看法的。这从萧何多次规劝他谨言慎行多收敛,每逢千钧一发之际又以其智慧和干练力挽狂澜才使他化险为夷,不难辨出作者的嗔怪之意。诚如仲呈祥先生所言,韩信生存的年代“正当中国历史由分封制向郡县制转换的关口”,韩信与朝廷抗衡显然有悖于历史潮流。但是创作者同时又高扬了韩信不畏强权的风骨、崇尚自由人格的品性和率真洒脱的真性情。剧作通过钟离昧自刎及韩信请求赐还钟离人头全尸安葬的事件,颂扬了他们之间超脱政治功利之友情的纯粹,也对他们竭力维护人格尊严、不甘于精神奴役,及他们对生命的超然大度等可贵的人品与人生境界肃然起敬。

尤其是,剧作对韩信与萧何作最后的诀别、坦然赴死以维护自我的一世英名给予了浓墨重彩的抒发:“萧何生韩信死、无奈生死见襟怀。我羞为自身起战祸,他苦为天下免兵灾,同怀着悲悯心肠深似海,齐将这生死荣辱轻抛开……”韩信这大段[反二黄]唱腔酣畅淋漓,不仅唱出了自我心声,更表达了将相二人在真切地感悟到对方生命律动中勇于相互担当的人间大义,既使人唏嘘,更让人钦佩!这里,创作者显然已给予人物正面评价:韩信之死不仅是一种解脱,更是一种精神的飞升!这部新编历史剧在对韩信这一艺术形象的塑造中,似乎寄寓了现代人格理想。作品所涉及的人物精神层面的追求,不正与当代人渴求独立人格、心灵自由、天性解放和自我价值实现等现代意识涌动相对接吗?我们看到其中渗透了创作者对生命价值、人生境界及人生态度的觉悟,也凝聚着创作者对理想信念和精神价值取向的期盼,甚至可将其视为对当代人价值选择、价值确立、价值定位或价值建构的一种参照与引导。

德国评论家莱辛说得好,历史剧创作“并不是为了纯粹历史的真实,而是出于一种完全不同的更高的意图”^⑥。那么,反观《成败萧何》创作者“更高的意图”是什么呢?我们看到,这部作品显然已超脱对人物作一般的道德评判和政治评判,也超脱了对封建专制政体的制度文化批判。透过历史生活表层的叙事,作品已触碰到民族性格中的集体无意识,触碰到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深层,试图突入精神价值腹地去勘探时代精神、民族精神和民族的灵魂;试图努力打通历史与现实的精神联系,与当代人的心灵诉求接通,与人类的现代性思考接通。

可以说,这部作品力求灌注深厚的人文精神,既有历史的纵深感又融入鲜活的现代意识并努力向现代性逼近,其精神指向试图直指当下,力求走向未来。剧中人萧何与韩信各自的悖论,有可能引发当代人的诸多思考:站在人性的立场,社会上每一个体的人,一旦面临国家命运与个人命运二者的尖锐冲突将如何化解?无论古人今人,徘徊于家国情感与个人情感二

者之间又将如何抉择？或可进一步思考：在特定历史情势下个体的人焉能与历史抗衡？甚至还可生发出：当代人应如何履行人类精神的历史性担当？观众是否会对诸如此类颇具思辨色彩、令人振奋发聩的哲学命题作一些引申思考呢？假如一部当代戏剧作品能够引爆如此话题、如此追问、如此哲思，其锋芒所指大有直逼时代思想前沿的势头，无疑将使作品更具深度、厚度和思考的力度，也更加有嚼头。在2011年的人大、政协“两会”上，文化部副部长王文章研究员郑重指出：“当代的文化创造，应该成为一种驱动社会发展的精神力量”；“文学艺术是精神领域的创造活动”，“应该以自身的精神创造引领时代的精神”：“通过精神创造的成果，可以体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的精神和价值取向”。^②我们期待着更多的文学艺术作品能够以人文思考的力量去引领当代人的精神价值提升，不知这一愿望是否契合京剧《成败萧何》的创作初衷？或许这仅仅是笔者更高的审美期待？

五

上海京剧院擅长创作、排演宫廷袍带大戏，不仅占有人才储备优势，行当齐全、演员阵容强大，而且剧院共同的审美理想和艺术追求所凝聚的艺术创造力也是不可抵挡的。京剧《成败萧何》的创作成就在于文学性与舞台性兼顾，不仅开掘出人文思考的深度，还向京剧艺术丰厚传统蕴藏的美学积淀探求，传达出精致、大气、凝重的审美气象，充分展示了民族传统艺术的当下魅力，如将之列为现代剧场艺术的又一成功范例应毫无愧色。

我们注意到二度创作中，导演石玉昆真正调动起综合艺术各个部门极大的创造性，如场面调度的大开大阖、张弛有度，既赓续了京剧舞台的传统程式又有所突破、有所创新。譬如钟离昧“演兵”的舞台处理，他选择用充满阳刚气势的男兵舞蹈场面替代传统的刀枪厮杀套路，伴以战鼓隆隆中力度强烈又灵动多变的节奏音型烘托出肃杀的气氛，画面十分壮观。这新颖的手法和创意，既增强了视觉冲击力又透着现代感，也显示出导演把握舞台的功力。

尤其让人关注的是，导演真正掌握了舞台空间以表演为主体的戏曲艺术之精髓。剧中无论是麒派老生代表性继承人陈少云与铜锤、架子两门抱的裘派花脸安平表演旗鼓相当，还是剧院中坚力量老生何澍，菊坛新锐梅派青衣郭睿玥、文武老生兼武生傅希如及荀派花旦杨扬等，都能穿行在“四功”、“五法”之间，在表演程式的继承与创新中“戴着镣铐跳舞”，显现出京剧艺术规范谨严的美感特质。他们沉浸在各自扮演的行当角色中，对娴熟的程式技巧重新开掘，在对人物的深刻体验中以创造性的发挥阐释人物情感、意志，追求“人乎其内，出乎其外”的艺术表达。

剧中萧何扮演者陈少云的麒派表演艺术最叫彩，真能抓住人物的魂魄，出神入化、淋漓尽致地挥洒出来。麒派表演艺术风格的独特性在于由内而外、有棱有角有力度，能在深切的人生体验中自然流露出一种沧桑感。麒派演剧观念着眼于“探究人心”，是内在体验与外在程式技巧的高度融合，充满深沉的人文关怀。陈少云对麒派风格元素的继承又有生长性的创造，能开发出麒派艺术的审美潜能。他化用了《跑城》中厚底靴跑圆场等各种步法、身段，能沉稳地拿捏到麒派[高拨子]演唱中独有的苍劲韵味；他借鉴麒派创始人周信芳先生在《乌龙院》等名剧中的各种肢体语言，能将引子、念白、导板、拖腔及身段、亮相节奏的细微处理等麒派形式美因素巧妙地化入萧何的表演中；他能在诸如紧乌纱、撩蟒袍等一系列繁难的程式技巧中，策动肢体的每一寸肌理，立体地呈现出萧何在特定戏剧情势下内心风暴中的惊涛骇浪；在戏剧冲突尖端时刻刀光剑影、充溢着杀伐之气的凝重画面中，他以麒派艺术浓烈的表演风格尽情地涂抹出人物激越的情感状态，恰如油画家将五色油彩堆砌于画布之上能生出一种质感，传递出更加深沉、更加厚重的意蕴。

京剧正值由传统艺术向现代艺术转型期，不仅要关注创作观念的更新和思想内涵的提升，也不仅为了炫耀表演程式技艺的精湛和流派艺术的承传，它一定要走向新的综合，让编剧、导演、表演、音乐、舞美方方面面和谐统一。京剧《成败萧何》为适应现代剧场艺术的要求，也为适应舞台艺术完整性的要求，在京剧艺术形式美元素的开掘中，对剧作旨趣予以诗意的表达，实现了内容与形式的浑然一体。

该剧的舞台景观以汉代宫阙标志性建筑为主要背景，既点染出时代风貌又平添了几分沧桑感；舞美设计中“汉”字大旗的高悬与坠落极具象征意味，残山、冷月、老树、黄叶、荒野等意象的点缀，十分简洁地勾勒出类似水墨丹青幽深隽永的意蕴，使戏曲艺术大写意的美学精神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展示。该剧叙事节奏明快，场景的流淌行云流水般晓畅。整部戏基本上以灯光为依托，或在纯熟驾驭灯光见收、拉开、化人和追、聚、放等各种语汇中完成画面的快节奏切换；或以同一句台词传递于不同人物之口的跳跃式场次衔接，完成酷肖镜头语言蒙太奇的舞台画面切换，都呈现出匠心独运的形式感。这自然、快捷、流畅的舞台画面切换方式恰与现代人心理节奏合拍，让观众体验到独具韵味的美感形态，整场演出就在特定戏剧氛围和任由人物情感流淌的诗、画对位中，让观众体味到更加深邃的意境。

该剧音乐创作中起用古琴演奏贯穿全剧,以古朴幽深的古琴音色和曲调传递出一缕苍凉的意味;器乐写作注重对特色乐器表现功能的艺术资源开发,如七场中一段以交响乐衬托京胡独奏点染人物心境的场景音乐独出机杼,是对京剧音乐表现力的开掘与强化,也是立足于声乐与器乐均衡发展的有益探索。剧中各行当人物的唱腔设计与布局得当,声腔丰富、板式变化多姿,艺术表现力十分丰富:如[西皮]声腔的板式运用就有导板、散板、流水、二六、快二六、快板等;[二黄]声腔变化出导板、散板、摇板及二黄三眼等板式;[反二黄]声腔则变化出散板、原板、二六及垛板等;[高拨子]声腔也变化出导板、散板、顶板、原版及摇板;它若[反西皮二六]、昆腔[清江引]的运用等,都在绰约多姿、繁复变化的声腔板式中,尽可能准确、细腻、贴切地传递出发自肺腑的人物心声。

六

京剧《成败萧何》的创作者在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予以审美表达中,力求人文思考和人性探索的足迹能与时代同步,洋溢着时代的气息,力求以更加深刻的立意直指人心、引发当代人的精神共鸣。《成败萧何》的创作者们试图由审美判断进入更加深邃的哲

理思辨层面,这并非是对艺术作品的苛求。因为艺术的终极目标是对世界和人自身的探索,与哲学致力于以上范畴人类观念的本质思考相互关联密不可分。

上海京剧院在新编历史剧创作中追求哲理的品格,能让观众从中获取独特的感悟,并获得思考的快慰和智性的满足,是促使当代民族艺术跨入更高审美境界的艺术追求。上海京剧院多年来的努力,正是在剧院集体的审美理想牵引中延续着京剧艺术的生命。应该说,上海京剧院全体同仁对民族传统文化走向现代、谋求京剧艺术的当代生存发展做出了创造性的历史贡献。

(责任编辑:楚小庆)

① 余秋雨《成功案秘》,《解放日报》,1989年1月26日。

② 《成败萧何:引向深层历史文化反思》,《中国文化报》,2011年1月12日。

③ 仲呈祥《凸显现代人文精神的成功之作》,《文汇报》,2010年6月2日。

④ 《〈成败萧何〉成在剧本》,《北京青年报》,2009年1月6日。

⑤ 龚和德《结构难点价值》,《中国戏剧》,2011年第2期。

⑥ 莱辛《汉堡剧评》。

⑦ 《王文章委员:文化创新的核心在于精神创造》,《中国文化报》,2011年3月15日。

Tasting the Sorrow Xiao He Experienced: Dialectic Nature of Newly Created Peking Opera "Xiao He both as a Winner and a Loser"

WAN Su

(Department of Art, Ministry of Cultur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eijing 100020)

Abstract: Created by Shanghai Peking Opera Troupe, "Xiao He both as a Winner and a Loser" presents its characters in a magnificent history course. The play profoundly involves several categories such as morality, responsibility, friendship, life, personality, inborn nature, dignity, and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 which endows the play with a humanistic quality. The play goes further to a philosophical speculation and it either owns a penetrating power to social, historical, contemporary and practical problems, or looks forward to a new development in spiritual life itself.

Key Words: Peking Opera; Humanity Reflection; Humanistic Quality; Philosophical Speculation; Spiritual View

(上接第161页)

Removal of a Notorious Fame of being Robber and Slave from Liangshan Assembling in Shuihu Drama in Yuan Dynasty

LIU Li-wen

(School of Literature,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24)

Abstract: In historical literature of Song and early Yuan dynasty, it recorded that Liangshan bawcock were loyal to emperor which later transforming into a pure righteousness to helping common people. This endowed Liangshan political force ever - called "robbers" and "thieves" with a sublime righteousness and a proud and independent spirit. Drama "Li Kui Asking for Forgiveness" mentions lightly the robber characteristics of Liangshan figures who become a group of Baoqingtians, and describes Liangshan as a serene and harmonious fairyland. Its robber - dispelling differs a lot from that of "Outlaws of the Marsh" and Shuihu drama in Qing dynasty, since there is an obscure expect of establishing an ideal society transcending the existing system.

Key Words: Shuihu Drama in Yuan Dynasty; Artwork; Robber - Removal; Slave - Removal; Artistic Creation